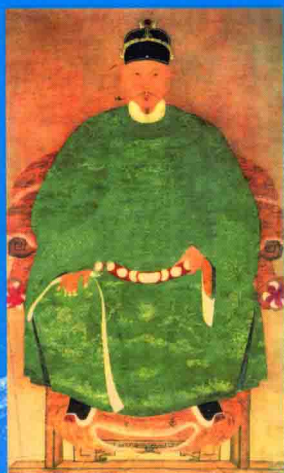


海洋文明丛书



海洋英雄 鄭成功

◎ 苏文菁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海洋文明丛书



海洋英雄 鄭成功

◎ 苏文菁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英雄郑成功/苏文菁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0
(海洋文明丛书)

ISBN 978-7-5615-5261-2

I. ①海… II. ①苏… III. ①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中国-当代 ②郑成功
(1624~1662)-生平事迹 IV. ①I235.2 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46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

插页:2 字数:180 千字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在上海的“触电”与感想

结缘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栏目、开讲“海洋英雄郑成功”完全是“中国文化”的缘分。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一切似乎都与“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然而在我的学术视野里有两个问题使我困惑多年：一是17世纪以来欧洲盛行的“中国风”，欧洲的文学艺术家对带有强烈中国东南沿海区域色彩的物品的喜爱，使我感到“不明就里”：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中国可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是谁将中国物产带到欧洲，进而引发欧洲人的创造性模仿？就如我们熟悉的英国诗人拜伦，他在诗才枯竭的时候不是向欧洲人自己的诗神缪斯祈求灵感，而是认为“一杯武夷红茶”更能给他清新的思路。二是欧洲人“到东方收获财富”与欧洲各国依靠海外掠夺与殖民完成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在中国人的知识谱系里却没有些许的蛛丝马迹；明清两代都在“闭关自守”。在东方的中国，是谁参与完成了人类历史的这种变革过程？其实这些问号只是表明一个事实：在我的知识体系里，世界文明史与中国历史是脱节的！

各种疑惑只有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才得到些许的解答。十几年前，因了一个小小的课题：“闽籍作家与外国文学”，我开始寻找“闽籍”文化的独特性。想不到这一脚进去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一般进入了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中去了。这其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身前身后事无疑是有研究意义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个性、人品与智慧是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殖民者的海洋角逐中捍卫了中国的海权，使中国成为当年东亚海域

的真正主人，甚至于也不仅仅因为欧洲各国文献中对郑氏父子色彩斑斓的描写，还有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对郑成功的崇拜与利用。但是，一定是这里的一切构成了我的知识体系中的“郑成功”。

郑成功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中华文明体系中值得去重读、反思的一个对象。特别是在16世纪以来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人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样的层面上，郑成功及其周边的那些人与事构成了一个很好的考察案例。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看郑成功在我们知识结构图里的变化，我们越发感受这句老话的经典意义。郑成功在有清一代从“伪”、“贼”到“民族英雄”的“华丽转身”本身就是值得我们仔细回味的文化建构历程。清初，清朝政府对于拥立了南明小朝廷、在东南沿海与清兵周旋的郑氏家族一定是以“贼”称之的，主流话语必定影响文人的表述与记载；特别是在清初文字狱的威慑作用之下，文人对郑氏家族的记载更是以符合清廷的意志为能事。这种状态直到1874年台湾牡丹社事件的发生才得以改变，那是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用兵。清政府也第一次意识到台湾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性，对台湾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政策；在文化上，经过沈葆楨等一些东南沿海籍大臣的力荐，将闽台民间的文化潜流——对郑成功的崇拜与信仰官方化。“郑成功崇拜”第一次在闽台区域浮出水面，成为当地民众抵抗外敌的精神偶像。而郑成功从区域的英雄成为“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又是与清末的民族革命有着紧密的关联。清末的革命党人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郑成功的历史资源：“反清复明”，并由此延伸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同时，将革命党的组织形态溯源到郑成功时代的商业军事秘密组织——海五商、陆五商之中去。从陶行知到孙中山，纷纷承认自己继承的只是郑成功的衣钵。如是，郑成功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完成了从区域到全民族英雄的转复。郑成功从此具有了民族英雄的双重指向：对外抗击外来侵略者，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对内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国家。这种民族英雄的双重指向在不同的时期会各有偏重，但一直维系到了今天，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郑成功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如此的转换意义与建构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闽台民间对郑成功文化的坚

守。由此可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珍贵，特别是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不同区域保持本土文化就更加弥足珍贵。

21 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全球化缘起于 16 世纪的大航海。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大航海时代就代表中国积极参与，且在海洋贸易与维护中国的海权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英雄郑成功身上挖掘出另一层的文化价值，那就是海洋英雄。

海洋英雄的海洋性体现在哪里？其与陆地上的英雄有何区别呢？或许我们无法在这样的篇幅里讲清如此巨大的题目。但是我们真实感受到的是在各种文艺表达形式中“海洋”因素的缺失。在郑成功的家乡，有立式的郑成功塑像——立于船头、岸边；有坐式的郑成功形象——大凡人都是要坐的；却也有马背上的郑成功，这其实就是人们不能理解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区别，进而混淆海上英雄与马背英雄的典型。这种以陆地文明覆盖一切的文化行为在影视节目上也表现突出，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在大洋驰骋的郑成功形象。或许，这还只是对海洋英雄郑成功的外在了解，郑成功的个性中所体现的海洋文化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努力去理解的内容。他的理想主义个性、对信念的坚守、平等思想，乃至对敌人、对手的尊重，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好好借鉴的文化遗产。

在上海即将开始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再出发”的 2010 年——这是我对“世博”的认知，我们和“文化中国”一道，在上海思考关于人性、关于道义、关于忠与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等，我觉得这真是我个人与“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缘分。我以为与我一般知识结构的同胞大有人在，当代社会最有力量的传播手段无疑是电视媒体，我乐意将我的思考借“文化中国”与真正关注中国文化的同胞分享。

（原载上海《文汇报》，2010 年 1 月 28 日）

全球化时代郑成功研究的意义

郑成功生活的时代虽然离现在已有三个半世纪，然而各个时代的研究却一次次地“复活”在我们的眼前。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角度述说着各自眼中的“郑成功”。从清初的“叛子逆臣”翻案为晚清的“爱国忠臣”，再从一个闽台区域性的民间英雄一跃成为全国性的中华民族英雄，郑成功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可谓风云变幻。与此同时，日本也以郑成功为日本国家之光、大和民族之傲，在对外扩张时期，甚至以之作为扩张殖民的“代言人”。而这个在东方备受追捧的英雄在西方的文献中，却被塑造成反面的形象：是可怕的“魔王”、“海盗”，又是“难缠”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二战后，东西方的学术界对郑成功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解读，不再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而是扩展到从经济、商业、海洋文化等方面研究郑成功及其掌舵的集团。日本对郑成功的研究回归到学术轨道，郑成功的出生地平户还以之开发旅游文化产业。西方则透过郑成功研究民族主义或者 16—17 世纪的世界贸易格局。1949 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各自的话语里塑造郑成功：在大陆郑成功一直是“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台湾则有着“蒋家时代的郑成功”与蓝、绿阵营不同色彩的郑成功。进入 21 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则顺应全球化时代、海洋世纪的潮流，重新定位郑成功的海洋形象，赞叹他所代表的海商集团在东亚海域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郑成功就像是一个多切面的钻石，每一个侧面在不同的光线下都有着不同的光芒。这一方面是由于郑成功本人及其活动的丰富多彩，为后人提供了多角度、多方面挖掘的可能；另一方面，毋庸置疑，

任何的解读或诠释都摆脱不了时代的“影子”，都有着时代的需求与意义。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竞争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攻城略地，而是经济（包括科技、军事力量，这些都是与经济直接相关的）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结合的较量。从海陆关系看，今天世界范围内，陆地资源及其归属已基本厘清，各国的目光聚焦在依然充满许多未知数的海洋上，因此海洋日益成为各国势力竞争激烈的场所。我们所在的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郑氏集团的家乡、泉州南安举办“首届郑成功文化旅游节”，南安市郑成功研究会为此准备了一道郑成功文化研究的“盛宴”：海峡两岸学人，从不同的视角汇聚“郑成功文化研究”。论文集选登的 24 篇论文中，除了传统的“郑氏复台”、“郑氏史料”、“闽台区域郑氏文化”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郑氏与海洋”的研究。有 7 篇文章以“海洋—海军—海商—海权”为讨论主题，凸显了全球化时代海洋意识在中国学界的复苏。郑成功无疑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成功的海洋英雄。他继承父辈的海洋事业，经营海上贸易网络，创造庞大的社会财富。在这过程中，郑成功不以殖民他国为目的，也未侵占过别国一丝一毫的土地。相反，他凭一己之力与欧洲殖民力量对抗，维护了中国的东南海权；通过贸易往来，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郑成功曾经的海洋活动、海洋文化因素能够与现在的时代有机地契合。从顺应时代趋势、时代潮流的角度出发，研究郑成功的海洋活动、海商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我们知道，郑成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国际化的人物之一，他所代表的郑氏海商集团是 17 世纪东亚海域上最活跃的力量，与欧洲东来的东印度公司、东南亚各国、日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氏集团的活动自然构成了东亚史、欧洲史乃至世界史的一部分。打通中外研究的隔膜，共享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我们今天应该多做的工作。我们看到本论文集里有了介绍欧洲人笔下的郑成功形象与日本学者石原道博的研究的文章。

然而，有关郑成功的海洋形象，特别是其对海上事业的经营活动，在以中原文明为正统的文化观念中，长期以来是被遮蔽或误读的。有关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尽管已发出一定的声音，但相比强大的“中原声音”与国

外的海洋话语，还是比较弱小。研究以郑成功为代表的福建海商集团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恢复原本多样性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更大的知识力量和话语资本，与海洋文明发达的国家进行平等对话。这也是研究郑成功所具有的学理上的意义。

在这样的学理依据之下，郑成功作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共有的英雄，其文化内涵已远不仅仅是恢复了汉民族对台湾区域的统治那么笼统了。具体而言，郑成功将中华文明中的海洋文明血脉延伸到了台湾，海峡两岸的闽台区域同是中华民族中海洋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区域。由此来讨论闽台两地的文化经济一体化更能够唤起人民的文化认同。同时，这种研究视野也能作为我们今天振八闽雄风、重塑海洋形象的内发性的文化动力与支撑。

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那种不安于现状的勇于开拓打拼、求新求变、包容精神与改革开放的精神内涵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福建两个先行区的建设。这些精神经过数千年闽人的演绎，特别是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代表的海洋英雄在海上的搏风击浪，早已积淀为现代闽人的文化基因，代代相承，在福建人的血液里奔腾。如今时代赋予了我们发展海洋、开展贸易的新机遇。重谈郑成功，重新挖掘以他为代表的海商精神，希望能够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激励、激发闽人身上绵延不断地开拓打拼的海洋文化精神，并将其转化成我们建设和谐发展的新福建、建设海西的文化动力与资源。

郑成功研究因此具有了区域的、民族的乃至全球的意义。

海洋英雄



郑成功

目 录

- 第1集 总说 / 1
- 第2集 郑芝龙的崛起 / 4
- 第3集 郑成功的出生与日本 / 13
- 第4集 父子分歧（上） / 19
- 第5集 父子分歧（下） / 26
- 第6集 郑成功子承父业 / 32
- 第7集 郑成功北伐 / 37
- 第8集 郑氏集团海外贸易活动 / 48
- 第9集 施琅与郑成功（上） / 52
- 第10集 施琅与郑成功（下） / 59
- 第11集 收复台湾 / 70
- 第12集 郑氏家族对台湾的开发 / 78
- 第13集 郑成功身边的女性 / 85
- 第14集 郑成功之死与郑氏后人 / 93
- 第15集 郑氏家族“归顺”清廷 / 107
- 第16集 “叛子逆臣”与区域英雄 / 112
- 第17集 晚清翻案 / 117
- 第18集 晋升民族英雄 / 121
- 第19集 郑成功与天地会 / 124
- 第20集 日本的郑成功（上） / 130
- 第21集 日本的郑成功（下） / 134
- 第22集 台湾民间的英雄与神灵 / 139
- 第23集 西方人笔下的郑成功 / 145
- 第24集 二战后多元的郑成功 / 154
- 第25集 二战后海峡两岸的视野 / 157
- 第26集 海洋时代的新形象 / 160
- 后 记 / 163

电视无疑是今天最有力量的主流传播媒体之一，我们今天在为各位朋友呈上影像资料的同时，也附上我们为栏目准备节目时的素材稿 26 集。或许，有心的您会在其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第1集 总 说

我们熟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生活的时代离现在已有三个半世纪。这 35 多年来，人们是如何评价郑成功的？他一直都是“民族英雄”这个形象吗？

我们知道，作为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海内外，包括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可的民族英雄。1949 年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各自的话语里塑造郑成功：在大陆，郑成功一直是“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台湾则有着“蒋家时代的郑成功”与蓝、绿不同色彩的郑成功。我们知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但在“民族英雄郑成功”上，主流的分歧是很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郑成功生活的时代里，人们称呼他是“反清复明”的大英雄，有清一代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郑成功就是在清末从“伪郑”变成为全体中国人都接受的“中华民族大英雄”。这又是怎样的情况促使郑成功的形象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并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在日本的文化、文学体系中，郑成功也是个了不起的形象。从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 年）的《国姓爷合战》（1715 年）开始，郑成功也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甚至于在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年代里，“郑成功”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一个符号。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其依据又是什么？在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时间里，台湾人民的郑成功形象被玷污了吗？如果没有，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者又是如何在文化上进行角力的呢？

郑成功生活的年代是国际风云激烈动荡的年代，东亚成了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博弈海外的主要战场。郑成功无疑代表亚洲、代表东亚与欧洲殖民者进行较量：驱逐当年的海洋强国荷兰，控制东南亚海域的贸易！郑氏集团在东亚海域展现了一个让我们这些后人都自豪不已、同时也扼腕叹息的海洋控制力！当年的欧洲人怎么看他？特别是荷兰人，抛开作为战败者的种种，可以看到，郑成功是也他们不得不钦佩的对手与英雄！

郑成功生活在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开始编织的初期，如果从全球化与海洋时代的视野来看，我们今天对郑成功是否在“民族英雄”的身份之外还应其他的了解。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对郑成功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解读，不再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商业、海洋文化等方面研究郑成功及由其掌舵的集团。日本对郑成功的研究回归到学术轨道，平户还以之开发旅游文化产业。西方则透过郑成功研究民族主义或者16、17世纪的世界贸易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则响应全球化时代、海洋世纪号召，重新定位郑成功的海洋形象，赞叹他经营海商集团的能力。

实行改革开放，在世界和平崛起，郑成功以及郑氏集团就是一个过去的成功典范。他继承父辈的海洋事业，经营海上贸易网络，创造了庞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郑成功不以殖民他国为目的，也未侵占过别国一丝一毫的土地。相反，他凭一己之力与欧洲殖民势力对抗，维护了中国的东南海权；通过贸易往来，他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郑成功曾经的海洋活动、海洋文化因素能够与现在的时代有机地契合。从顺应时代趋势、时代潮流的角度出发，研究郑成功的海洋活动、海商事业就有时代的意义。

然而，郑成功的海洋形象，特别是其对海上事业的经营活动，在以中原文明为正统的文化观念中，长期以来是被遮蔽或误读的。有关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尽管已发出一定的声音，但相比强大的“中原声音”与国外的海洋话语，还是比较弱小的。研究以郑成功为杰出代表的福建海商集团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用研究成果填补原本多元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更大的文化力量和历史资本，与发达的海洋国家进行平等对话。

第2集 郑芝龙的崛起

1624年8月27日，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岛的海湾小镇千里滨。郑成功出生在日本，而不是祖籍地中国福建南安，这就必须从其父郑芝龙说起。

郑芝龙到日本经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 明朝禁止私人海洋贸易，其中与日本有特殊关系，即倭寇问题。明日双方对朝贡有不同的理解。日本将之理解为商业行为，承包给在日本的福建商人，导致1513年宁波“争贡之役”，1551年停止朝贡之后又发生“嘉靖之乱”。1567年明政府开海澄（月港），日本虽然还在禁之列，但福建商人还是可以各种借口假托前往。

2. 日本方面，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推行往东南亚贸易的“朱印船”制度。1600年，德川家康上台，继续推行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而承包者绝大部分是福建海商，其中著名的就有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为了谋求与明朝关系的正常化，日本政府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进行贸易，郑成功的外祖父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福建泉州到日本长崎的。但是，到了郑成功出生的前一年、元和九年（1623年），日本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在平户的英国商馆也在这一年关闭了，来长崎的外国人仅有中国人与荷兰人；同时，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

3. 促使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下令锁国的外因就是欧洲宗教、商业势力对日本的影响。葡萄牙1514年“租占”澳门，30年后在日本建立

了商业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在日本九州设立商业据点；1600年，荷兰人也到达日本九州；1613年，英国人也在九州的出岛获得立足之地。欧洲人所带来的宗教信仰给日本幕府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威胁。另外，日本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产银国，银又是换取中国物产的硬通货；欧洲人的商业活动无疑使日本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澳门经历

有意思的是，最早进入东亚贸易圈的葡萄牙人把澳门办成了培训中国海商国际化的第一所大学校。郑芝龙是这所学校优秀的学生，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郑芝龙16岁离开家乡福建南安，与许多福建人一样，他选择了前往当时最国际化、最混乱也最有机会的澳门。在这里，他的舅舅、商人黄程是他的第一位老板。

黄程是个以澳门为据点、经营马尼拉—澳门—福建沿海—日本长崎之间贸易的商人。在澳门期间，郑芝龙的许多事迹都已无可考了，但是有3件事是确实的。

1. 他是舅舅国际化海洋贸易的有力助手，获得了以后成为东亚海域霸主的最初经验，并进入以福建商人为主的华商贸易网路，熟悉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游戏原则与语言。

2. 接受天主教洗礼，得教名“尼古拉·一官”。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以及欧洲文献中，只有“尼古拉·一官”而没有“郑芝龙”。

3. 在澳门期间，郑芝龙娶了第一位妻子陈氏——福建漳州陈姓商人的女儿，生下长女郑婉舍、二儿子郑焱。二儿子郑焱过继给郑芝龙的弟弟郑芝虎，死于1661年。郑婉舍，也就是郑成功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土生葡人。所谓“土生葡人”就是在澳门而不是在欧洲葡萄牙本土出生的葡萄牙人。

1624年，郑成功刚刚出生，郑芝龙便以日本为基地跟随李旦和颜思齐闯荡，先是当上了荷兰人船上的通事，接着又跟颜思齐来到台湾开发。1625年，当郑芝龙的事业不断上升之时，李旦和颜思齐相继去世。郑芝龙

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多年闯荡海洋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快就将两位商业大佬的地盘、人才、资源收为己有。不久，郑芝龙便在台湾建立起与荷兰人对抗的、以福建海商为主的武装商人集团。

崛起后的郑芝龙面临着与三股势力相对抗的局面——其他中国海商势力、明廷以及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主的欧洲殖民者。这三股势力中，相对好对付的是其他的私人海商势力，最阻碍其发展的是明廷的政策，而最强大的敌人则是欧洲殖民者。面对这三个强大的敌人，郑芝龙制定了一套巧妙的计划，准备将三股势力逐个击破。

西方殖民者与日本海商皆有政府做后盾

我们知道，西方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是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财力雄厚，武装力量强大，这些是中国海商所无法拥有的。因此，虽然中国海商也有比较庞大的贸易网络，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政府做后盾，还要频繁受到政府的打压，加上各个中国海商力量属于“散户”性质，没有一支强大的、能掌控全局的势力，所以根本无法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

在东方国家中，日本海商也比中国海商有优势。当时日本有“御朱印船”贸易者，代表着政府对外贸易，以强悍好战闻名，欧洲殖民者也不得不让其三分。自从荷兰人侵占台湾以后，在台湾筑城构堡，威胁利诱中国商人与之做生意，使得日本商人原先在台湾的利益大受侵害。德川幕府为了保护朱印船贸易者在台湾的通商利益，下令对到平户经商的荷兰人采取制裁措施，从而迫使荷兰人与日本人分享台湾的商业利益。荷兰人自己都说：“因为我们在日本的地位，不同于我们在东印度的任何其他王国，在那里，我们可以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取得贸易权，而在日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他们对我们一点也不在意，不怕我们加害于他们。”

明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在欧洲东印度公司东来的强大拉力之下，纷纷下海贸易——欧洲人把原来中国海商需要到南洋，或是过马六甲到印度洋才能获取的市场，直接推到了中国沿海的“家门口”，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形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市场。但是，这些中国海商都是以血缘、

亲缘、地缘为关联组成的小单位，既要对付自己的同伴，与其他中国海商势力相竞争，以做大自己；更要对付明朝政府军的围剿与欧洲人的火炮。如此，中国的海洋力量——此时只有民间的海洋力量，犹如一盘散沙，面临着被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各个击破、一网打尽，中国完全丧失海权也是有可能的。

此间，中国最需要的是：所有海商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合力来对付欧洲各东印度公司。

郑芝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英雄！

在郑芝龙看来，明代中国海洋所面临的诸多危机、矛盾中，中央朝廷的海禁政策是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在16世纪以来的全球海洋争夺中，要在当时激烈的东方海上贸易竞争中夺得一席之地，需要有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本身要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二是要有国家政权作为其坚强后盾。郑芝龙深知这两个基本条件需要突破明朝政府的政策方可获得。但是，郑芝龙也深知，要让明朝政府全面修改律令，改“禁止私人海洋贸易”为“开洋裕国”，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但是，能否在局部，特别是东南海面上与明朝政府形成相互利用与妥协的局面呢？郑芝龙那时就有建立“特区”的念头了。

郑芝龙是如何做的呢？首先，在与明政府军队周旋时，郑芝龙一定要打“胜战”，抢占据点，虏获大量明政府官兵。然后，善待这些官兵，让明政府官兵成为积极向上峰“举荐”郑芝龙的得力说客。最后，在1628年8月，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出任厦门海防游击。这是一场很漂亮的战役！郑芝龙集团由此开始了从冒犯明朝律令的“海盗”、“走私者”向代表明朝政权利益的武装海商集团的转变！

其实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十分困难、几近不可能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海权的无知与政权的反人民性，以及以郑芝龙家族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的坚韧。